

親歷

史

丛书主编 李辉 向继东



向继东 主编

新启蒙年代：

我的80年代的阅读

一扇乍然开屏的
思想之门
一段不可复制的
阅读之幸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新启蒙年代：

我的80年代的阅读

向继东 主编

丛书主编 李辉 向继东

親歷
史

廣東省出版集團
廣東人民出版社

· 廣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启蒙年代: 我的 80 年代的阅读 / 向继东主编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1.4

(“亲历历史”丛书)

ISBN 978-7-218-07086-5

I. ①新… II. ①向… III. ①读书活动-概况-中国-1980-1989
IV. ①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2346 号

新启蒙年代: 我的 80 年代的阅读

向继东主编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金炳亮

出版策划: 钟永宁

责任编辑: 周米亚 谢海宁

装帧设计: 张竹媛

责任技编: 周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218-07086-5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: (020) 83781421

关于“亲历历史”丛书

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历史的见证人，对亲历了深刻影响社会、改变他人命运的重大事件者来说，更是如此，个人经历的自述，是整体历史的映射，历史的亲历者与历史的研究者共同书写着刚刚逝去的历史。

克罗齐说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，说出了历史求索的当下指向和主观性，也说明了解读当代历史的意义。但今日不少国人，特别年轻一代，对当代历史往往陌生。他们可能对千百年前的皇朝故事说出一个子丑寅卯，但对几十年前的人和事，却不得而知或不予置信。国家文化认同和个人精神家园的建造需要文化认同，文化认同离不开家国历史的传承记忆。历史在当下断裂，文化的飘摇、信仰的迷失和物质主义的甚嚣，与此攸关。

历史亲历者的自述有利于还原历史事件和社会整体历史真相，有利于揭示社会变动时代的个体生命境遇和心迹，有利于展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，也能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。可以预期，随着亲历者的年华老去，他们的这些珍贵记忆将如一坛陈年老酒，散发着岁月的芬芳。

无视亲历者记忆的主观性是不现实的，我们并不否定记忆的偏差，我们只是希望我们这些主人公的记忆，为历史解释提供多一种可能。

处于或接近风暴中心的人，才更能讲清风暴。列入亲历历史系列者，主要是当代重大事件制造者、参与者，影响社会进程的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现象的倡导者和引领者，以及与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者。

纳入本丛书的每一种选题，或是叙述者对参与的某一或几件重大事件的记述，或是众多亲历者对某一事件、人物或现象的记述。文体均以第一人称形式呈现，可以是亲历者直接书写，也可以是亲历者口述、他人整理。忆述者描述当时的历史场景，直接记述过程本身和个人心迹。我们不希望将其写成个人自传或历史评论。

从历史亲历者的口中重寻读者最关心的历史往事，描摹历史的原色，彰显当代历史的丰富性和鲜活性，将干瘪枯燥的历史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历史，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理想。期望有同好的历史亲历者、历史书写者和历史研究者以及关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人们，与我们同行。

出版者

序

序

大约十年前，我曾写过《一种凭吊》的短文，说的是有关作家何士光的书事。上世纪80年代我做着文学梦，喜欢读何士光，他的小说大都读过，印象深刻。大概是2000年吧，在一特价书店见到何士光的小说集《蒿里行》。书是海南出版社出的，里面收了《草青青》、《青砖的楼房》、《薤露行》、《蒿里行》、《苦寒行》、《种包谷的老人》、《喜悦》、《日子》等十多个中短篇。这些小说我都读过了，且被感动过。见到这本书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，但不是为了读，而是为了一种凭吊。今天编这样一本书，说实话，也是为了“一种凭吊”……

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，也是新启蒙的年代，还是思想分化、多元开始的年代。由于几十年的思想禁锢，在“读书无禁区”的鼓动下，当时读书热蔚然成风，如《走向未来丛书》、李泽厚的美学、《第三次浪潮》等等，几乎家喻户晓。一个作家，只要有一个短篇获奖，一夜之间就全国知名了。其实，文学是边缘化的，变得如此轰动倒不是正常的。就如现在，哪怕你写出了准《红楼梦》，关注也是有限的，因为它毕竟不同于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活动，那样直接地揪人。但那时就是这样，征婚广告往往不忘加上“爱好文学”字样，好像如此就可以为自己加分——这就是80年代的真实图景。

记得周扬曾在纪念“五四”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，他说中国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，第一次是“五四”运动，第二次是“延安整风运动”，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。我在这里引述“三次论”，并非完全赞同他的观点，如“延安整风运动”研究就有不少新成果，能否算得上还值得商榷。这里引述，只是强调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重要。80年代末，王元化先生曾主编《新启蒙》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），一共出了四辑，至今还放在我书架上。每每重读这份沉甸甸的丛刊，总能勾起我对那时的回忆和无限遐想。

在80年代，什么主义和原则，什么流派和风格，什么新论和悖论，都可以读，可以讨论。有人说：80年代是一道永远唤不回来的风景。此话确否？我以为有点过于悲观，从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来看，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提出的“四大自由”肯定是发展的主流，大势所趋，谁也无法逆转，当然任重道远也是无疑的。

回想那时，文艺界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，出现了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、韩少功的《爸爸爸》等；史学界以黎澍为代表的觉醒者，大胆质疑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”和“农民战争动力论”等传统史观；理论界更是风起云涌，仅从198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李洪林的《理论风云》一书，就可见一斑。该书几乎记录了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全过程，如《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》、《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》、《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》、《“信仰危机”说明了什么》、《领袖和人民》等系列文章，都是那时争相传阅、脍炙人口的。本书组稿时，我本来约李老写一篇“我与《读书无禁区》”之类的文章，但李老晚年寄情于书画，对于为文，惜墨如金，几乎不接受任何稿约了。后来我再三坚持，李老发我一篇六万余言的《往事回忆》，其中有《〈读书无禁区〉的故事》一节。李老回忆说：

一九七九年春天，三联书店创办《读书》杂志，找我约稿。我写了一篇《打破读书禁区》。这篇文章引起《读书》编委们的兴趣，决定把它当作《读书》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。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，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：“读书无禁区”。果然一炮打响，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。这五个字一直都是《读书》杂志的旗帜，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。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，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。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，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，不如原题之无懈可击。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，不往回改了，这是因为：

第一，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、范用等出版界元老，与我虽非至交，却属知己。他们改题，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，而且更加铿锵有力，读起来也容易上口。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，并引以为荣。

第二，更重要的是，此文一发，立刻引起强烈反响。这里有两个“烈”：一是热烈欢迎，一是猛烈反对。知识界是热烈欢迎，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。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

反对：读书无禁区，这还了得！“小学生能看《金瓶梅》吗？”这是义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。《读书》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。在这篇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，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自承担《读书无禁区》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，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“读书无禁区”这个口号了。

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。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，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，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《金瓶梅》。白纸黑字俱在，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，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……

这里特别感谢李洪林先生，得他允诺把《读书无禁区》收入此书，并专门补写了一个新的“附记”，使读者在阅读这篇旧文时，能捕捉到更多的信息，也为本书增色不少。

还得说说本书的缘起。两年前的深秋时节，我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钟永宁先生、市场读物编辑室主任肖风华先生等出差上海。旅途中，钟永宁先生谈起出版社将要推出的“亲历历史”丛书，让我编一本“回忆80年代读书生活”的书，可以放在该丛书里推出。而此书需要向作者约稿，考虑到稿费标准不高，组稿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所以我迟迟没有响应。后来在钟永宁先生的一再催促下，才做起来。现在书已付梓，钟先生对此书的编排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尤其是文章的取舍和分类，钟先生斟酌再三，没有他的努力，还真不知道此书能否顺利出笼。还有责任编辑周米亚、谢海宁为此书也倾注了大量辛劳，在此谨致谢意。

最后还要衷心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。他们有的虽然写了文章，也写得很好，但出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或受本书篇幅所限，有些很好的文章我们不得不割爱，有些长文还略有删节。在此一并说明，特致歉意。如有作者出书两个月后尚未收到样书，请直接与出版社责编联系。

向继东

2011年4月21日于长沙

书禁初开

《读书无禁区》并附记 / 李洪林 / 002

《读书无禁区》触碰“禁区” / 陈晓 / 010

那个年代，那种阅读的幸福

没错过，刚刚好 / 卢周来 / 016

诗忆 / 王彬彬 / 022

师大 80 年代的读书风气 / 格非 / 029

出井感言 / 符号 / 035

读书何处觅疯狂 / 魏得胜 / 042

刚有书读的那些日子 / 徐南铁 / 046

读书人短暂的幸福时光 / 周孜仁 / 050

读书太少 / 王跃文 / 056

我怀念那种“饥饿感” / 罗韬 / 059

白加黑与红加蓝 / 刘诚龙 / 061

回忆那时的读书生活 / 刘兴雨 / 067

爱读书，但没有读书生活 / 谢泳 / 071

我的读书历程 / 汪秀枝 / 074

少年不知读滋味 / 易水寒 / 078

80 年代那些云烟 / 赵野 / 082

刻骨铭心的那本书

-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/ 朱学勤 / 092
 毫无目的的残酷 / 景凯旋 / 098
 书里书外：遇罗锦童话在小城 / 毕星星 / 103
 真诚，让阅读变得可爱 / 朱大路 / 109
 带着《围城》漂泊 / 孙玉祥 / 114
 提倡启蒙，超越启蒙 / 徐怀谦 / 119
 靠什么填补鸿沟 / 汪强 / 127
 《解冻》唤醒了我心中的人道主义 / 王志龙 / 132
 并非怀念那“蓝蚂蚁”生活 / 孙丹年 / 138
 我与《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势》 / 王重旭 / 146
 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/ 黄波 / 152
 染乎世情的阅读 / 蔡瑛 / 157
 奥威尔的《1984》在中国 / 闲田野牛 / 161
 那个年代：老鬼与《血色黄昏》 / 岳建一 / 166
 一部禁书的中国遭遇 / 陈晓萍 / 173
 80 年代的阅读 / 何小竹 / 179

从 80 年代一路读来

- 阅读是成长的宿命 / 梁卫星 / 192
 我的阅读 / 林贤治 / 201
 时代阅读与个人经验 / 雷颐 / 210

80 年代的出版热

- 钱伯城谈 80 年代的出版热 / 黄晓峰 / 216
 说说 80 年代的几套丛书 / 数帆老人 / 221

书禁初开

《读书无禁区》并附记

■ 李洪林

读书无禁区

在林彪和“四人帮”横行的十年间，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，都经历了一场浩劫。

这个期间，几乎所有的书籍，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，从书店里失踪了。很多藏书的人家，像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，被人破门而入，进行搜查。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，就像逃犯一样，被搜出来，拉走了。

这个期间，几乎所有的图书馆，都成了书的监狱。能够“开放”的，是有数的几本。其余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，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，通通成了囚犯。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，真比探监还难。

书籍被封存起来，命运确实是好的，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。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。后来发现，烧书毕竟比较落后，烧完了灰飞烟灭。不如送去造纸，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。这就像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，既增加了铁的产量，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。而且“煮书造纸”比“砸锅炼铁”还要高明。“砸锅炼铁”所铸的锅，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，是简单的循环；而“煮书造纸”所印的好多书，则是林彪、陈伯达、“四人帮”，还有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“左”派的“最最革命”的新书。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”的新书，其“伟大”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。于是落后的“焚书”就被先进的“煮书”所代替了。

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，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，“四人帮”就会告诉他说：这是对文化实行“全面专政”。你感到惊讶吗？那也难怪。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。

是的，对文化如此摧残，确实是史无前例的。

两千多年前，秦始皇烧过书。他烧了多少？没有统计。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，写在竹片上的，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，但是从种类和篇幅来说，肯定

比不上林彪和“四人帮”对书籍这一次“革命”的战果如此辉煌。

烧的烧了，煮的煮了。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？大部分禁锢，小部分开放。

在“四人帮”对文化实行“全面专政”的时候，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，已经无法计算。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。当时有一个《开放图书目录》，出了两期，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。这就是说，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，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，能够蒙受“开放”之恩的，只有一千多种！

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，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。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。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，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。但是，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禁书政策相比，从秦始皇到蒋介石，全都黯然失色。理工农医书籍除外（这类书，秦始皇也不烧的），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，充其量不过几千种，而“四人帮”开放的书，最多也不过几千种，这差别是多么巨大！

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期，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，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，只能和樟脑做伴。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，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，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！

历史是公正的。对人和书实行“全面专政”的“四人帮”，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。在中国的土地上，春天又来临了。被禁锢的图书，开始见到阳光。到了1978年春夏之交，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。门庭冷落的书店，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，成了最繁荣的市场。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，排到交叉路口，又折入另一条街道。从《东周列国志》到《青春之歌》，从《悲惨世界》到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，重新和读者见面了。那长长的队伍，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。

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。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，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、教育、科学、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，外国朋友们看出来了：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，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，作为自己的起点，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，实现四个现代化。

像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，1978年重印的一批名著，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。经过十年的禁锢，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！

但是，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。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，“四人帮”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，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。

这个原则问题就是：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？

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，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，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，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，放到水里去煮，所有这些行动，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：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。什么书是可看的，什么书是不可看的，以及推而广之，什么戏是可看的，什么电影是可看的，什么音乐是可听的，诸如此类等等，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。

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。相反，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，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。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。当然，林彪和“四人帮”是不管这些的。什么民主！什么法制！通通“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”！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，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“全面专政”，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。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。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“全面专政”，而是认为群众都是“阿斗”，应当由自己这个“诸葛亮”来替人民做出决定：什么书应该看，什么书不应该看。因为书籍里面，有香花也有毒草，有精华也有糟粕。人民自己随便去看，中了毒怎么办？

其实，有些“诸葛亮”的判别能力，真是天晓得！比如，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就被没收过，小仲马的名著《茶花女》还被送到公安局，你相信吗？如果让这种“诸葛亮”来当人民的“文化保姆”，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？究竟什么是香花，什么是毒草？应当怎样对待毒草？这些年让“四人帮”搅得也是相当乱。例如，《瞿秋白文集》本来是香花，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，在社会上起革命的作用，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，这已成为历史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但是，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，于是，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。谁规定的呢？没有谁规定《瞿秋白文集》应当变成毒草，而是“四人帮”的流毒，使人把它当作禁书。

文学书籍，被弄得更乱。很多优秀作品，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，便是“毒草”，便是“封、资、修”，便是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。“四人帮”这一套假道学，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，因为它道貌岸然，“左”得可怕，以致有人像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。本来在社会生活中，“饮食男女”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。在书籍里面，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，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，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。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，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。不要因噎废食，不要“八公山上，草木皆兵”，把很多香花都看作毒草。

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，应当采取什么政策？

任何社会，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。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，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。就是在所谓西方自

由世界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，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、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。因为这种“自由”，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。任何社会，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，都不能熟视无睹。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，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。

不过一般地讲，把“禁书”作为一项政策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。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。群众愈没有文化，就愈容易被人愚弄，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。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，要开列一大堆“禁书”书目。其实，“禁止”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。因为这种所谓“禁书”，大半都是很好的书，群众喜爱它，你越禁止，它越流传。所以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。如果没有“禁书政策”，是会产生这种“乐事”的。



1988年，王元化创办《新启蒙》丛刊于上海，邀请北京一些朋友共襄此事。此照于商谈后同游太湖时所摄。前排：冯媛（左一），邵燕祥（右二），张显扬（右一）。中排：于浩成（左三），戈扬（左四），张可（左五，王元化夫人），王若水（右二）。后排：王元化（右三），李洪林（右四）。

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，对全部人类文化，不是采取仇视、害怕和禁止的态度，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，批判地继承的态度。同时我们也有信心，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，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，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，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。因此，我们不采取“禁书政

策”，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。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，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。他说：“康德和黑格尔的书，孔子和蒋介石的书，这些反面的东西，需要读一读。”（毛泽东 1957 年 1 月 27 日《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》）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，对于反面的东西，“不要封锁起来，封锁起来反而危险。”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，对于好书，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。

当然，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。对于书籍的编辑、翻译、出版、发行和阅读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。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、败坏社会风气、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，必须严加取缔。因为这类图书，根本不是文化。它极其肮脏，正如鲁迅所说，好像粪便或鼻涕。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，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。当然这种毒菌是极少的。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，可以少印一点。但是不要搞神秘化，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。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，都要进口一点，以便了解情况。有的要加以批判，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。不要搞锁国主义，不要对本国保密，当然也不是去宣传。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，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，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。不要前怕狼，后怕虎。要相信群众，要尊重历史，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。历史上流传下来的、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，必有它存在的价值。这是 we 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。

在书的领域，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，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，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，而不是放任自流。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，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。应当打开禁区，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，有助于实现“四化”的图书，不管是中国的，外国的，古代的，现代的，都应当解放出来，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。

世界上没有绝对的“纯”。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，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。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，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。否则，只好头戴防毒面具，光喝蒸馏水了。打开书的禁区之后，肯定（不是可能，而是肯定）会有真正的坏书（不是假道学所说的“坏书”）出现。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。让人见识见识，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。

（原载《读书》1979 年第 1 期）

附记

《读书无禁区》承蒙读者厚爱，已经三十多年，至今有人“犹记”。不过其中有一段文字，自己回顾时并不满意。原文如下：

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，对全部人类文化，不是采取仇视、害怕和禁止的态度，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，批判地继承的态度。同时我们也有信心，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，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，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，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。因此，我们不采取“禁书政策”，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。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，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。他说：“康德和黑格尔的书，孔子和蒋介石的书，这些反面的东西，需要读一读。”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，对于反面的东西，“不要封锁起来，封锁起来反而危险。”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，对于好书，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。

此段文字，不曾脱离思想解放的主题，结论也不错，但却带有中国历史转折点上的时代烙印。现在略作分析，并作自我批评，尚希读者见谅。



范用（左）、李洪林（右）摄于北京范用寓所